

晚清俄语教育概观

郝淑霞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 晚清俄语教育始自京师同文馆。在同文馆的推动下, 地方俄语教育在一些临近俄国的边疆地区发展起来。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颁布后, 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 俄语教育也得到较快发展, 一些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不同程度开设俄语课程, 俄语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清末的留俄教育给学生提供了优越的俄语学习环境, 推动了中国俄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拟就这一时期俄语教育发展脉络作一综述, 展现其发展历程和特点。

关键词: 晚清; 俄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一、同文馆及同文馆推动下的地方俄语教育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洋务运动, 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改革宗旨, 以期达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洋务派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新式学堂, 兴办“西学”, 作为向外国学习的一种途径。在洋务派实施的新式教育中, 外语教育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创办的新式学堂大多是外国语文学校, 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中国官方第一个以西方语言文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教育内容的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创立, 它最初单纯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 而后逐步发展、扩大, 成为具有多种学科、综合性的高等学堂。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历时近四十年之久,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外交翻译人才, 是培养外交使领官员的摇篮。

1863年馆内开办俄文馆, 京师同文馆俄语教学比较重视翻译, 侧重学用结合。俄文馆除按课程表肄习正课外, 还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 不拘一格, 组织安排学生参加一些各类语言实践活动, 随使出洋, 充当随团翻译, 翻译报刊电函, 旁听会晤, 既在语言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听、说、写、译能力, 又直接或间接参加外交事务活动, 熟悉了对外交涉。俄文馆培养了近代中国首批俄文外交翻译和教师, 在我国俄语教育史及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继京师同文馆之后, 1863年、1864年在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广州相继开办了同文馆性质的地方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在课程设置方面, 上海广方言馆并未开设俄语, 广州同文馆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开设俄文馆。

在同文馆的推动下, 中俄交往频繁的西北和东北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俄文学堂, 就近培养俄语人才。光绪十三年(1887)仿照京师同文馆, 在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新疆俄文馆, 挑选学生学习俄语。馆内设俄文教习和汉文教习各一人, 分立课程。俄文教习先后由同文馆出身的桂荣和桂煜充任。该馆学生毕业后派往需求俄文翻译的伊犁、塔城、喀什

噶尔等地供差，并且能很好地胜任工作，为中俄交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北地区 1887 年成立了珲春俄文书院，又名“珲春翻译俄文书院”。同文馆毕业的庆全和毛鸿遇先后任俄文教习，挑选八旗子弟 15 名入院学习俄文，专学翻译，以应需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它的成立给以积极、肯定的评价：“边疆办理交涉，必须两国言语文字融会贯通，方无窒碍，珲春添设俄文书院，因地制宜，诚为当务之急。”（朱有瓛 1983：305）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立黑龙江俄文学堂，培养办理中俄交涉之人才，同文馆俄文翻译瑞安担任俄文教习。经过 3 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具备了较高的俄文水平，3 年期满考试时，“学生均能熟谙俄语，应对无滞，出题翻译华文俄文，亦各清通。”（孙子和 1977：484）

在天津，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教育家严复于 1896 年 7 月创办了俄文馆，兼任俄文馆总教习，出身同文馆的刘崇惠曾任俄文教习。严复对俄文馆教学认真负责，自俄文馆开办伊始，他就亲自拟定课程、聘请教师及管理一切教务。据《国闻报》记载，1898 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他亲自主持俄文馆学生的季考。（林开明 2005）天津俄文馆开创了天津俄语教育先河。

在华中地区，基于湖北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外贸商务需要，光绪十九年（1893）由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自强学堂的创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自强学堂在成立伊始就确定了很有远见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出学习外语的重要意义，“造就通材，所期远大，欲使学者皆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则可深窥立法之本源，并可曲阐旁通之新义，既不必读辗转传翻之书，致得粗而遗精，亦不至墨守西师一人之说，免致所知之有限。将来学成以后，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功用甚宏。”（朱有瓛 1983：307）

在课程设置方面，自强学堂并没有完全效仿京师同文馆，由学习外语进而兼学外语、格致等，而是根据社会发展和湖北的具体需要，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有意义的试验。在开办时设方言（即各外国语言文字）¹、格致、算学、商务四馆，每馆招收学生 20 人。张之洞指出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甲午战争中中方告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之洞深深感到依靠办学培养人才、谋求自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提高了其对外语教育的更深层的认识。他亲自审定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自强学堂对课程陈旧框架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把算学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一律改课方言。方言各国不同，按其重要分立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学生以 30 名为额，各聘教习，分门授课。从此，自强学堂成为一所开设 4 国语言文字的专门学校，学制 5 年。张之洞特别重视俄语的学习，提出时局紧迫，俄、日文尤为切时之用，充分肯定了俄文的重要地位，这与俄国对汉口茶叶市场很感兴趣有一定的关系。1861 年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顺丰、新泰、阜昌等茶厂，开展茶叶贸易，垄断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市，因此培养俄文人才尤为需要。在给时任总办蔡锡勇的札文中他解释道，“中俄近邻，俄文需用尤殷。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字之意，在于培植志士，查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限，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朱有瓛 1983：307）从中可见自强学堂并非单纯培养翻译人员。

自强学堂在教习的聘用方面，对俄、德文采取了不同于英、法文的方式，考虑到英文、法文各省传习较久，派华员为教习，而俄文、德文的学习普遍罕见，分派俄员、德员为教习，附以华员协同授课。“俄文原本希腊，与英法德之拉丁者不同，更为专门之学，自宜延访俄人之通华语者为教习，庶裨指授。”（朱有瓛 1983：310）学堂聘请了 3 位俄文洋教习，他们是波立沙、萨哈哪甫斯祁和喀凌呵。（朱有瓛 1983：317）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这是湖北有普通中学的开始。

二、近代第一个新学制颁布后的俄语教育

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发起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他们主张全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学习西方办学模式，改革教育。京师大学堂（1898年）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开始。清政府于1902年、1903年分别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对包括外语教学在内的西学的推广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年清政府成立了学部，统辖全国教育行政事务。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和新式教育影响的扩大，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俄语教育在京师和地方的大学堂、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及中学堂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大学堂俄文课的设置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京师大学堂是由政府官办的第一所多系科的综合性大学。1898年颁布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多达25门的学生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10门溥通学为必修课，英、法、俄、德、日本语言文学，每位学生自选一种，采用各该国的原文教科书，与10门溥通学同时并习。

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学校停办两年，1902年学校复学后，颁布的第二个建校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同文馆归并之后，经费无著，变通办法，拟于预备、速成（包括仕学馆、师范馆）两科中设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之专科，延聘外国教习讲授”，并详细列举出了大学7种分科，其中文学科下设外国语言文字（英、法、德、俄、日5种）。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新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正式提出大学设置外国文学专业，属文学科大学，其中俄国文学门与所有其它文学门一样，每周总课时24学时，其中主课俄语俄文9学时，辅助课有俄国近世文学史、俄国史等6门，此外还有随意科目。据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单记载，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教授俄文的教习有洋教习卜录达，副教习恒安；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二年间有魏雅廷、周宝臣、谦光。

京师大学堂设有译学馆。译学馆前身是创办于1861年的京师同文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底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改为翻译科。1903年为造就外交人才，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附近设立译学馆，将原翻译科与之合并，是年9月开馆授课。宣统三年十月译学馆停办，历时十年。

《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译学馆“以译外国之语文，并通中国之文义为宗旨，以办交涉教译学之员均足供用，并能编纂文典，自读西书为成效”，“译学为今日政事要需，入此学者皆以储备国家重要之用，自以修饰品行行为先，以兼习普通学为助”。译学馆外国文分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5科，每人认习一科，达到精通，不得兼习。无论所习为何国文，皆须学习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等9门普通学及交涉、理财、教育3门专门学。教授外国文先授以缀字、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二三年后兼授各国历史及文学大要。学习以5年为限。译学馆教员由中国教员和俄籍教员组成。在馆任教的中国教员有京师同文馆毕业的余大鹏、范绪良、郝树基、陈嘉驹，俄籍教员有伊凤阁（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葛理格。（蔡璐 1999：197）

译学馆自开办起分年招考共计5次，称为甲、乙、丙、丁、戊级。光绪二十九年92人考入甲级，光绪三十一年120人考入乙级，光绪三十一年73人考入丙级，光绪三十二年300人考入丁级，光绪三十三年50人考入戊级，（蔡璐 1999：195）共计645名学生。译学馆为了广育人才，特设附学一科，招收12—20岁的有志学习者自费入馆学习，遇有正额学生有缺时，可作充补。译学馆五级共毕业350名学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甲级毕业41人，宣统元年九月乙级毕业69人，宣统二年九月丙级毕业40人，宣统三年八月丁级毕业139人，宣统三年九月戊级毕业61人，（蔡璐 1999：198）近十年间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对外交涉人才、翻译人才。

译学馆除培养办理交涉人员、译员外，馆中设有文典处，进行词典的编写工作。文典的编写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文典的印刷、出版为外语教学、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翻译书籍文报及自学外语提供了内容丰富又实用的工具书。

译学馆在人才培养、教学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较以前的同文馆有所不同，译学馆的办学成就突出，对此曾在译学馆讲授国文及西洋史的蔡元培先生作了简短评述。他在为纪念译学馆停办二十周年所编写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一书的题词中写道：“译学馆为偏重外国语之学校，其所以与同文馆、广方言馆等不同者，有两点：一兼习国文；一兼授其它学科；是也。有此二者，是以译学馆虽办理不久，同学亦为数不多，然而其中之高材生，或服务社会，卓著成绩；或更求深造，成为专门学者；或从事译著，有信、达、雅三长；使此短期之学校，在历史上可以不朽。”（李良佑 张日昇 1988：120）

除京师大学堂外，山西大学堂开设了俄文，北洋大学堂 1906 年开设了俄文班，俄文教育是俄籍学者来觉夫（Aely Ander Saptew）和德籍讲师赵克悌。俄文班的培养目标是俄文翻译人才，四年毕业，毕业学生 14 人。（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1990：59）

高等学堂、中学堂俄文课的开设

光绪二十九年（1904）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所修外国语有英语、德语、法语，教学内容皆为讲读、文法、翻译、作文。虽有此明确规定，但各地高等学堂出于各种原因并未完全遵照执行，所设外国语种纷歧百出。有的高等学堂也开设俄语课程，如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外文就包括日、俄、英、法 4 种，俄文由阎澍恩教授。（赵元贞 水梓 谈凤仪 1995：111）鉴于此，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1909）学部咨大学堂通咨各省统一高等学堂外国语课程。考虑到当时西北诸省俄事交涉日繁，学部对俄语课的设置作了相应规定，提出“预备入法政科大学研究中俄交涉及预备入文科大学之俄国文学门的，不妨于高等学堂中添习俄语，应将俄语一门也作为第一类的随意科”（朱有琳 1987：584），充实了高等学堂章程对外国语的规定。中学堂外国语包括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外国语的教学内容为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

随着洋务活动的增加和新式教育影响的不断扩大，不少地方省份也纷纷设立方言类学堂，俄语教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东北地区，为了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满足吉林对外交往的客观需要，光绪三十二年（1907）在省城吉林创办了吉林外国语学堂，专习英、法、俄、日、德 5 国语言文字，每科定额 30 名，学习语言文字之暇研究各国现行政要，历来交涉成案等，5 年毕业后给予出身。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奉天方言学堂成立，挑选中学程度较优者入学学习英、日、俄 3 科。

东北地区除官办的俄文学校外，还有私塾性质的俄文学校。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吉林俄文学校毕业吴晋康获准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设立俄文学社。“查组织学社，原以研究学业本准自由设立。该生拟在呼兰设俄文学社，事属可行。”（黑龙江省档案馆 1988：472）这一学社的创立表明，清末俄语教育并非完全、单纯依靠官立学校，私塾性质学校的俄语教育补充、充实了中国的俄语教育，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

清政府新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推广和实施也推动了华中地区方言类学堂乃至俄语教育的发展。湖北彭君方言学堂内分英、法、德、俄、东 5 国语言文字；江西方言学堂设英、法、俄、日 4 国语言文字。这些外国语学堂大都是地方官吏或开明绅士开办，规模不大，开办时间亦不长，所以它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微小。（李良佑 张日昇 1988：39）

在当时的中学堂中，颇具特色的开设俄语教学的是 1908 年创办的湖北汉口华俄商业中学堂。学校经费由俄国茶商拨给。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独具特色。开设俄文、中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除中、英文两门课外，其余课程均用俄文授课。学生学习

重点是中译俄。所用教材，取自武汉、上海两地的报纸。学生的译文交由教员、翻译整理校订，然后编辑成册，成为一种不定期刊物，定名为《扬子江流域》。（周肇文 2002：794）它一方面作为教学材料发给学生阅读参考，另一方面还送给汉口俄商，或寄给外埠和俄国的俄人，让俄人能及时、更多的了解中国当时的商业、经济情况。可以说，达到了一举两得的双重效果。该校原定办4年，因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校内学生自行解散，学堂停办，实际创办只有3年。两次招生共百人，中途退学者有三分之一多。以俄文就业者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在社会上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清末洋务派实施“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时期，虽然俄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不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值得师法之处不多，但是中俄两国毕竟是近邻，彼此交往频繁不断，“加之彼得大帝又被洋务派和维新派一致尊为起衰振蔽的历史伟人，康有为甚至将自编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一书呈光绪帝，希望后者以“大彼得之心为心法”。（蒋路 1997：263）因此，清政府派留学生时并未忽视俄国，也向俄国派出了部分留学生。

中国近代史上官方正式派遣官办学校学生游历外国始于1866年斌春率同文馆学生3人随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1835—1911）出洋考察法、英、俄、德等国，而派学生正式出国留学则是1872年派幼童赴美国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大突破。它打击了当时的顽固守旧风气，打破了封建教育的封闭格局，开启了中国直接从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知识的进程，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当时的俄国经历了彼得大帝励精图治的改革，由一个闭塞落后的国家挤入了欧洲强国行列。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俄国吸引了清政府派团前去考察、游历、派学生留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派遣学生赴俄游历或游学的大权一直掌握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手里。所派赴俄的学生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主，学成回国后大多担任翻译和外交工作。清后期的留俄教育始于京师同文馆的俄文馆。俄文馆的塔克什讷、桂荣、庚善、福连曾随团出洋。尽管这种早期留学方式时间短，又不定期，但它对提高学生的俄语水平、培养优秀的翻译和外交人员有着重要的意义。随使的学生可以凭借在国内打下的俄语基础，利用在俄的最佳语言环境，在语言实践中加强自己的听、说能力，同时还可通过见习翻译，学习对外交涉，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可以说，它是正式留俄教育的萌芽。此后又派学生随换届使臣一起出洋，并住馆学习。俄文馆派出的首批寓居馆留学生4人：邵恒浚，桂芳，李鸿漠，陈嘉驹。清政府对驻馆学生规定了明确的学习任务和学习期限以及严格的奖惩办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鼓励，促使留俄学生潜心学问，努力学习俄语，增强俄语的表达、运用、交际能力。

随着俄国的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备、教育质量的提高，各种专门学校教授的科目，与英、法、德等国相比无甚悬异，尤其是铁路学堂、矿物学堂教学质量更为出色，吸引了中国学生前去留学深造。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清帝谕旨总理衙门妥议章程，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工、商、矿等实业。满清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都纷纷向俄国派遣留学生，中国的留俄教育由专门学习俄文语言文字转而进入全面学习西学、西艺。

光绪二十六年（1900）总理衙门奏派京师同文馆学生张庆桐、傅仰贤、陈瀚和郝树基4人赴俄国留学，进入彼得堡铁路等学堂，学习铁路工程等专业。在中央除总理衙门外，学部和邮传部也向俄国派遣留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学部官费选派译学馆学生魏渤、柏山两人入彼得堡皇家大学堂学习法政专科，以备毕业回国后在京师大学堂任教。宣统元年（1909）三月上海学生李宝堂自费赴俄，入彼得堡铁路大学堂学习铁路专门科，后由邮传部提供学费。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湖北总督瑞方首开省级留俄先例，选派湖北方言学堂学生

萧焕烈、夏维松、严式超、刘文彬 4 人赴俄入彼得堡皇家大学堂学习法政专科。继湖北之后，黑龙江、吉林也相继向俄国派遣留学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向俄国派遣过幼童赴七河省中学留学，为期 3 年，并派大学生 2 名驻俄照料。这是新疆第一批赴俄留学生。后又加派大学生两名前往。为了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新疆玉山英学校曾派克里木等 7 名学生赴俄国喀山师范学校学习深造。江苏省虽没有直接派学生赴俄学习，但他们给自费赴俄的魏立功以官费待遇。

除中央和地方各省官费派遣学生留俄外，自费留学生也不远千里，赴俄学习深造。在俄自费留学生中，既有满清权贵子弟，又有华侨子女。此外还有职官游学和贵胄赴俄学习。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留俄学生的管理，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留学教育的法规章程，使留学教育基本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还在宣统元年九月任命章祖申为留俄学生监督，负责留俄学生的考核、指导和监督工作。

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单独派遣学生留俄相比，1899 年以后的留俄教育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官费和自费留学、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选派同时并存，留学形式多样化；留学成员范围扩大，留学生不仅限于学堂中的学生，还有官吏、贵胄等；留学专业大为扩展，不再限于语言文字，而是发展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专业领域。总的来说，与留学英、法、德等国相比，留俄人数较少。据清政府驻欧洲各国留学生监督呈报，在 1908 年至 1910 年前后，中国留欧学生以官费为主，总共约 500 人，其中留法学生 140 余人，留英官费生 124 人，留德学生 77 人，留俄学生 23 人。（卫治国 1998：280）

留俄教育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对选派学生的俄文水平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派遣学生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学生的俄文程度，基本上挑选具有一定程度的俄文水平的学生官费赴俄，以便尽快克服语言障碍，达到以俄语为工具，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获取专业所需信息。1906 年学部对留学资格作了明确规定：“嗣后京外派遣留学生，无论官费私费皆应切实考验，性行纯谨，具有中学堂毕业程度，通习外国文字，能直入高等专门学堂者始予给咨”（陈学恂 田正平 1991：29），这一规定基本上符合当时俄国各种学堂入学资格、入学考试科目要求。从章祖申的《留俄学生学务报告》中可知，当时俄国的农、工、商、矿务、工程等实业学堂基本上要求在中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才能入学，入学时须考俄文。因此对留俄学生俄文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推动了俄语教学的发展。

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奴化教育

甲午战争后，沙俄侵略者一步步地向中国东北扩张势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在旅大地区不仅进行野蛮、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还进行文化侵略。

自 1898 年 3 月到 1905 年 1 月日俄战争沙俄军队战败退出旅大的七年间，沙俄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兴办学校。一类是为俄国人设立的学校，另一类学校则是为中国人设立的，称为俄清学校，其目的“在于为机关团体培养通晓俄语，并忠诚于俄国的低职中国职员”，“在金州设立俄清学校，是金州占领后，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因为该地原至关东州的政治中心，所以于该处设俄清学校最为重要，将以这种机构对中国传授俄国思想。”（李喜平 1998：241）。沙俄在旅大境内相继开办了 15 所俄清学校。学习的科目主要是俄语，课时几乎占了一半，此外还有算数，初等地理历史，设有村长和支书、警察署员及翻译人员的业务实习，经过学校培训 4 年后，发给特别证书，并享有当村长、试用教师、翻译以及州内行政官衙里职员的优先权。

五、结语

从整体上看，晚清的俄语教育主要以培养近代对俄交涉的翻译、外交人员为目标，采取

国内教育和留学国外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俄文人才的培养。由于对俄文人才的需求不一，俄语教育发展呈明显的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中俄交涉较多的东北、西北地区。长期与俄交往表明，要在对俄交涉中不受欺蒙，要了解俄国，进行中俄文化交流，必须进行俄语教育，培养我国自己的俄文人才。我国早期俄语学者邵筠农先生在《中等俄文典》序中强调指出学习俄文的重要性。他说：“俄罗斯横亘中国边陲，犬牙相错，广袤逾二万里。自尼布楚条约以后，通商互市，订约修盟，二百余年，绵延罔替。夫以两国关系如此其钜，则所以审其国情，观其政治，考其文化风习，接纳其士大夫，相与输情款，缔交游，期无虞于隔阂者，舍取途于语言文字之学，无他道也。”（转引自张小曼 1995：357）

不可否认的是，与学习英、法、德、日语相比，当时学习俄语的人可谓是寥若晨星。当时中国俄语教育面临很多困难，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情和社会背景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俄语教学界本身即主观上的因素。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和腐败落后的观念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但对俄国却缺乏兴趣，学习俄语自然就缺少动力。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就俄语本身而言，俄语属斯拉夫语系，其语言体系、语言结构、文法等都有很多特别之处，中国人学习与母语完全不同体系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此外，缺乏合适的教材以及缺少高水平的师资也是制约当时俄语教学发展的因素。早期著名俄语学者邵筠农在《中等俄文典》评序中简洁指出了学习俄文的一些困难：“考俄文出于古斯拉夫文，其文法之繁琐，远非英法德文之比；而英法德文，我国均已编译多书，俾学者得识门径，循序渐进，独俄文会诸阙如，以繁难之文字而乏良善之教材，然则学者望而却步，相率视为畏途者，亦何足怪！”（转引自张小曼 1995：357）晚清的俄语教育在困难中缓慢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附注

1 所谓“方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语言。清末将外国文视作国内的地方方言，把传授外语的学校称为“方言学堂”，体现出清政府仍然具有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

参考文献

- [1]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1990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 [2]蔡璐 1999 京师译学馆始末[A]，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3]陈学恂 田正平 199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4]郝平 1998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5]黑龙江省档案馆 1988 俄文毕业生吴晋康呈请设立俄文学社准自由组织由，《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上编）。
- [6]蒋路 1997 俄国文史漫笔[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7]李良佑 张日昇 1988 中国英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8]林开明 2005 严复与天津俄文馆，今晚报，3月8日。
- [9]齐红深主编 1992 东北地方教育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 [10]璩鑫圭 唐良炎 199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1]舒新城 1985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2]孙子和 1977 清代同文馆之研究[M], 台北: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出版。
- [13]卫治国 1998 中外教育交流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4]张小曼 1995 张西曼纪念文集[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15]赵元贞 水梓 谈凤仪 1995 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回忆[A],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17卷)[C], 中国文史出版社。
- [16]周肇文 2002 汉口华俄商业中学堂[A],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17]朱有瓚 1983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8]朱有瓚 198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HAO Shu-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300071)

Abstract: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dated from The Tong Wen Bureau in Pekin. From then on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began to grow in frontier regions adjacent to Russia. After promulgation of the first school system of China,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developed in Chinese schools and institutes. The measure of sending students to Russian schools in Late Qing Dynasty further promoted the course.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收稿日期: 2006-02-15

作者简介: 郝淑霞(1967-), 女, 河北省迁西县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俄文化交流、中国俄语教育史。

[责任编辑: 靳铭吉]